doi. 10. 3724/1005-0566. 20261008

城市“内卷式”竞争与新动能培育:基于创新型企业进入的分析

戴宏伟[1,2],乔莹莹[1],李　靖[2]
(1.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2206;
2. 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北京　101149)

摘　要:新动能培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而在涌入新赛道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城市的“内卷式”竞争及“欲速则不达”的后果,其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只看到了竞争的机遇而忽略了“内卷”的风险。本文通过双线霍特林博弈理论模型构建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城市“内卷式”竞争对地方新动能培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创新投入和改善创新生态促进新动能培育,且在创新禀赋较好、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有助于缩小地方债务规模、降低地方债务风险,为新动能培育创造良好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引导地方政府更加注重长期创新环境建设、资源配置优化与财政可持续性,为新动能培育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新动能培育;“内卷式”竞争;创新型企业;创新生态
中图分类号:F124.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6)10 - 0087 - 13

Urban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nd new growth momentum: Evidence from innovative firm entry

DAI Hongwei[1,2], QIAO Yingying[1], LI J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101149,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new growth drivers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anwhile, in the process of foraying into new tracks, cities have witnessed “involution” competition, bringing about consequences of haste makes waste. The underlying reason is that some local governments only perceiv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competition while ignoring the risks of “involution”.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a two-line Hotelling game model,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how urban “involution” competition affects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new growth driv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cline of “involution” competition can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growth drivers by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ncreasing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better innovation endowment and higher fiscal transparency.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mitigation of “involution” competition helps curb the scale and risks of local debt. Henc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隐私计算技术促进消费者数据流通的效应、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25BJL015)。

作者简介:戴宏伟(1967—),男,河北定州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物资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创新与区域发展。通信作者:乔莹莹。

greater restraints should be imposed on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guiding them to prioritize long-term innovation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optimize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 new growth driver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novative firms; innovation ecosystem

培育壮大新动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加快培育新动能、推动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不但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导向,也在引导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受传统 GDP 考核体系及竞争“锦标赛”的影响[1],地方间存在典型的“内卷式”竞争现象,其突出特征是产业选择上的盲目性,即不惜偏离地区发展基础、依赖非正常优惠政策和过度资源投入进行重复建设,在经济发展中过度追求短期利益而忽略长期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2-3]。当前社会各界主要关注企业层面的“内卷式”竞争,即以“价格战”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无底线“卷价格、卷成本、卷赛道”,甚至偷工减料、牺牲产品质量以降本降价,引发整个行业产生负面连锁反应,阻碍产业高质量发展。而城市层面的“内卷式”竞争同样具有破坏性,一些城市不顾自身比较优势跟风招商引资,盲目进军自身不具备优势的新兴产业以抢赛道、争项目,并以税收减免、土地特惠、厂房白送等非正常优惠进行无序、恶性竞争。这种过度追求眼前利益和短期政绩而忽视自身长远优势培育的“内卷式”竞争,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阻碍和重点整治内容①。如何引导地方从短期、过度的“内卷式”竞争向长期、有序的良性竞争转变,也是 2025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点工作之一。

从现实来看,一方面,地方竞争也在“与时俱进”地把招商引资的重点聚焦在新兴产业上;另一方面,在地方竞争的诸多举措中,土地出让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推动经济扩张的重要工具[4]。因此,本文汇总整理了 2007—2022 年我国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程度与新动能培育的演变情况,以工业用地出让均价体现地方“内卷式”竞争[5],以创新型企业进入数衡量地级市新动能培育情况[6-7]进行分析。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竞争在 2007—2012 年间波动较为明显,自 2013 年起呈现出显著且持续的下降趋势;地方新动能培育水平则在 2013 年后显著提升,期间虽伴随一定年度波动,但总体上升趋势较为清晰。从图 1 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与新动能培育水平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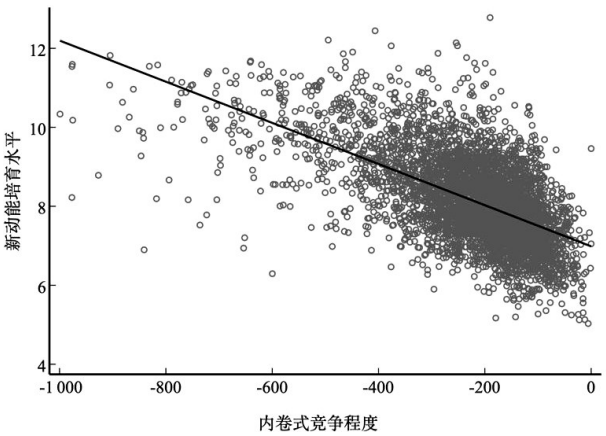

图 1 “内卷式”竞争与新动能培育散点图

本文的分析与两方面的文献密切相关。首先,现有研究主要从行业和企业层面考察“内卷式”竞争的形成逻辑及经济后果,对城市层面的“内卷式”竞争关注有限。部分文献从行业或企业层面探讨了“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路径[8-10],认为可通过实施链长制产业链政策、构建战略合作联盟等方式,缓解企业层面的“内卷式”竞争[11-12]。还有文献重点关注“内卷式”竞争的经济后果,发现其不仅会扭曲企业创新激励而不利于颠覆性创新[13],还会加剧市场逆向选择,降低资源配置效率[14]。相较而言,目前针对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研究仍较为有限,仅有个别文献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内卷式”竞争会降低

① 参见:新华社:如何整治“内卷式”竞争让市场更加健康有序?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3/content_7015155.htm.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15],并扩大地方政府的新增隐性债务规模[16]。其次,现有关于我国新动能培育的基本逻辑、省域差异及历史演进的讨论多为定性研究[17-18],部分文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视为产业层面新动能的载体[19],而提高创新投入、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20];政府补贴、产业引导基金等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效果[21-22],但余东华等[3]、Prud'homme[23]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总体来看,这些相关文献多聚焦探讨培育新动能的具体政策工具或产业自身特征,对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这一重要现象及对新动能培育的影响关注不足,对于其内在机理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剖析和实证探讨。

相对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内卷式”竞争的研究视角由企业、行业层面拓展至城市层面。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或行业角度考察价格战、成本竞争及其经济后果,忽视了城市之间的“内卷式”竞争同样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并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动能培育产生不利影响。为此,本文构建了双线 Hotelling 模型,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与企业异质性决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内卷式”竞争对新动能培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将“内卷”问题的分析从条状的企业、行业拓展至块状的城市,为理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第二,立足于新动能培育与高质量发展,丰富了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及其影响的研究。部分文献探讨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资源整合、地区经济波动等方面的影响[24-25],但对于地方政府竞争是否会影响新动能培育,特别是是否会阻碍创新型企业进入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缺乏直接讨论。本文立足新时代背景将创新型企业进入作为新动能培育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拓展了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研究边界。

第三,为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前期许多地方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低价供地等优惠政策的“内卷式”竞争,容易扭曲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要素配置,进而加剧区域间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除了规制企业内卷式竞争,更需要规范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行为,引导其由“拼政策、拼优惠”的短期、恶性竞争转向“拼环境、拼服务”的长期、良性竞争,将政府“有所为”的着力点放在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上,以新动能培育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

一、理论模型

(一)模型设定

在现实中,无论是地方招商引资竞争还是新产业的竞争,焦点大都集中在对潜在进入企业的竞争,尤其是重点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即创新型企业。因此,本文以霍特林模型为基础拓展并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参与“内卷式”竞争如何影响企业选址决策。

1. 产业特征空间

假设存在长度为 1 的产业特征空间[0,1],所有城市和潜在进入企业均位于该空间内,企业在产业特征空间中的位置代表了企业选址偏好,记每单位距离带来的落户成本为 t②。

2. 地方政府

存在地方政府 A 和 B 两个博弈主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竞争潜在进入企业:一是提供优惠政策,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所有潜在进入企业在城市 i($i \in \{A,B\}$)可以获得同样的优惠政策和营商环境。当地方政府 i 在优惠政策方面付出 e_{1i},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投入 e_{2i} 时,其成本为 $c_i = \frac{1}{2}(e_{1i} + e_{2i})^2$。

3. 潜在进入企业

一类是传统产业相关企业,简称为传统型企业,在模型中记为类型 T;一类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简称为创新型企业并记为类型 I。分别

② 产业特征空间类似于霍特林模型的城市空间,落户成本类似于霍特林模型中单位距离带来的交通成本。

有一单位传统型企业和一单位创新型企业，均匀分布在[0,1]区间内。企业在作出落户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三个因素：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地方营商环境和落户成本。

记企业类型为 j（$j \in \{T,I\}$），在产业特征空间中的位置为 k，则企业 j_k 落户城市 i 的期望收益为：

$$\pi_{ijk}(e_{1i},e_{2i}) = f(e_{1i}) + \theta_j g(e_{2i}) - td_{ik} \quad (1)$$

其中，θ_j 代表企业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一般情况下，创新型企业更为在意营商环境，因此设定 $\theta_T < \theta_I$。$f(\cdot)$ 和 $g(\cdot)$ 分别代表地方政府 i 在优惠政策和营商环境两个方面的投入对企业的效用函数，为方便求解，设定企业的总效用函数为拟线性函数，具体为 $f(e_{1i}) = \lambda e_{1i}$，$g(e_{2i}) = 2\mu_i\sqrt{e_{2i}}$。其中，$\lambda$ 越大代表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受到的约束越小；当 e_{2i} 保持不变时，μ_i 越大则营商环境改善效果越显著。d_{ik} 为企业 j_k 与城市 i 在产业特征空间中的距离，则 $d_{Ak}=k$，$d_{Bk}=1-k$。

4. 企业落户决策

当 $\pi_{Ajk} > \pi_{Bjk}$ 时，企业 j_k 落户城市 A 的期望收益高于落户城市 B，因此将选择落户城市 A；反之，当 $\pi_{Ajk} < \pi_{Bjk}$ 时，企业 j_k 将选择落户城市 B；当 $\pi_{Ajk} = \pi_{Bjk}$ 时，企业 j_k 落户城市 A 或城市 B 没有差异。记 k_j^* 代表类型 j 企业中在落户两个城市间没有差异的空间位置，容易得到：

$$k_j^* = \frac{\lambda(e_{1A}-e_{1B})+2\theta_j(\mu_A\sqrt{e_{2A}}-\mu_B\sqrt{e_{2B}})+t}{2t} \quad (2)$$

当 $k < k_j^*$ 时，企业 j_k 将选择落户城市 A；当 $k > k_j^*$ 时，企业 j_k 将选择落户城市 B。

5. 地方政府收益

记引入 1 单位 j 类型企业的收益是 P_j，地方政府 A 与 B 引入企业落户的收益分别为：

$$\begin{cases} u_A(e_{1A},e_{2A}) = p_I k_I^* + p_T k_T^* - \frac{1}{2}(e_{1A}+e_{2A})^2 \\ u_B(e_{1B},e_{2B}) = p_I(1-k_I^*) + p_T(1-k_T^*) - \frac{1}{2}(e_{1B}+e_{2B})^2 \end{cases} \quad (3)$$

（二）均衡求解

由于城市 A 和城市 B 是对称的，先对城市 A 进行分析。简单起见，不讨论角点解，根据一阶条件 $\frac{\partial u_A}{\partial e_{1A}} = \frac{\partial u_A}{\partial e_{2A}} = 0$，化简后可得：

$$\begin{cases} \frac{\partial u_A}{\partial e_{1A}} = \frac{\lambda(p_I+p_T)}{2t} - (e_{1A}+e_{2A}) = 0 \\ \frac{\partial u_A}{\partial e_{2A}} = \frac{\mu_A(p_I\theta_I+p_T\theta_T)}{2t\sqrt{e_{2A}}} - (e_{1A}+e_{2A}) = 0 \end{cases} \quad (4)$$

求解后可得均衡情况下地方政府 A 的最优投入水平为：

$$\begin{cases} e_{1A}^* = \frac{\lambda(p_I+p_T)}{2t} - \left[\frac{\mu_A(p_I\theta_I+p_T\theta_T)}{\lambda(p_I+p_T)}\right]^2 \\ e_{2A}^* = \left[\frac{\mu_A(p_I\theta_I+p_T\theta_T)}{\lambda(p_I+p_T)}\right]^2 \end{cases} \quad (5)$$

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称性，可以得到引理 1。

引理 1：当 $t < \frac{[\lambda(p_I+p_T)]^3}{[\mu_A(p_I\theta_I+p_T\theta_T)]^2}$ 时，均衡状态下地方政府 i 的最优投入水平为

$$\begin{cases} e_{1i}^* = \frac{\lambda(p_I+p_T)}{2t} - \left[\frac{\mu_i(p_I\theta_I+p_T\theta_T)}{\lambda(p_I+p_T)}\right]^2 \\ e_{2i}^* = \left[\frac{\mu_i(p_I\theta_I+p_T\theta_T)}{\lambda(p_I+p_T)}\right]^2 \end{cases} \quad (6)$$

最优总投入水平为

$$e_i^* = e_{1i}^* + e_{2i}^* = \frac{\lambda(p_I+p_T)}{2t} \quad (7)$$

（三）优惠政策投入对创新型企业入驻的影响分析

引理 1 提出了地方政府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解，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受官员锦标赛和“内卷式”竞争的影响，对优惠政策选择的偏好更强。因此，本文进一步讨论，如果地方政府偏离了均衡结果，其优惠政策投入将如何影响创新型企业入驻。以地方政府 A 为例，根据前文分析，地方政府 A 的总投入为 $\frac{\lambda(p_I+p_T)}{2t}$，将 e_{2A} 视为 e_{1A} 的函数，结合式(7)和式(3)并利用对称性分析代入式(2)可提出并证得命题 1。

命题 1：在均衡点附近，地方政府在优惠政策竞争方面投入越多，引入的传统型企业越多，创新型企业越少。

(四)影响地方政府优惠政策投入的因素

对引理1中地方政府的最优投入水平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到命题2。

命题2:在均衡状态下,有以下因素影响地方政府优惠政策投入:

(1)城市创新禀赋,$\frac{\partial e_{1i}^{*}}{\partial \mu_i} < 0$;

(2)单位优惠政策投入对企业的吸引效果,$\frac{\partial e_{1i}^{*}}{\partial \lambda} > 0$。

命题2反映了两种能够影响或约束地方政府在优惠政策方面投入的因素:一是城市的创新禀赋,如前所述,在城市创新禀赋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投入的收益相对越大,而对优惠政策竞争的依赖会更少,吸引创新型企业数量也越多;反之亦反。二是单位优惠政策投入对潜在企业的吸引效果,如果中央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利用优惠政策开展恶性竞争,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相关政策要求越严,或地方财政透明度越高,则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的成本越大,结果会降低单位相关投入带来的效果,也会减少地方政府对优惠政策的投入。

(五)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影响

中央可以通过发挥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推动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而非经济发展的“量”。根据这一思路对引理1做进一步延伸分析,可以得到命题3。

命题3:干部考核改革会改变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程度,当$(p_I + p_T)$保持不变时,$\frac{\partial e_{1i}^{*}}{\partial p_I} < 0$。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识别策略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为实证检验地方“内卷式”竞争对新动能培育的影响,本文设定基准模型为:

$$y_{cjt} = \alpha + \beta\, compet_{ct} + \gamma\, Control_{ct} + \mu_c + \eta_j + \lambda_t + \varepsilon_{cjt} \quad (8)$$

其中,下标c、j、t分别代表城市、二位码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y_{cjt}为t年c城市在二位码行业j的新动能培育水平;核心解释变量$compet_{ct}$为c城市t年的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程度,其估计系数β是本文实证关注的重点,若β显著为负,则表明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下降有助于促进新动能的培育。*Control*是本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μ_c为城市固定效应,λ_t和η_j分别是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ε_{cj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在基准回归采用稳健聚类标准误。

(二)变量说明

1. 地方“内卷式”竞争

现有文献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程度[15,26],或基于GDP增长率、人均GDP排名构造地区间的横向竞争指标[27],但实际上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而非直接体现。从“内卷式”竞争的行为逻辑来看,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为争夺有限的企业和投资资源,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要素补贴降低企业进入成本,从而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其中,土地出让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推动经济扩张的重要工具[4],因此本文参考相关文献以工业用地出让均价体现地方“内卷式”竞争水平[5]。

2. 新动能培育

根据“创造性破坏”理论,新企业进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进入往往伴随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发展[6-7],是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28],本文参考现有文献[19],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数(创新型企业)作为地级市层面新动能培育的衡量指标。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22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土地出让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本文对原始数据汇总并做如下处理:①剔除成交金额或供地面积存在异常值与缺失值的地块,排除未进行土地等级评估的样本;②保留工业用地样本(工业用地是地方政府为吸引潜在企业在土地出让上更直接的体现);③利用成交价格和供

地面积计算每宗工业用地的出让单价,为避免简单加权平均可能带来的测量偏误,基于地块出让面积占该城市工业用地出让总面积的比重,加权得到地级市层面的工业用地平均出让价格③。

创新型企业进入数据来自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并剔除以下样本:①注册地址缺失或无法准确匹配至地级市的企业;②营业起始日期与成立日期同时缺失或两者不一致的企业;③企业类型和行业类别缺失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的行业代码和企业工商注册信息中的行业代码,汇总得到城市—二位码行业的创新型企业进入数、进入比重以及退出数等指标。

控制变量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得到,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鉴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与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呈反向变动关系——"内卷式"竞争越激烈,政府越倾向于以较低价格出让工业用地——本文对该价格数据进行了方向调整,使 *compet* 指标与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保持同向变动。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Sei_number*	创新型企业进入数(ln)	303 267	1.886 7	2.319 7	0.000 0	13.448 1
	Sei_ratio	创新型企业进入数/企业总进入数	303 267	0.369 6	0.415 5	0.000 0	0.881 4
	NewDynami	(创新型企业进入数 - 退出数)/企业总进入数	303 267	0.092 9	0.482 2	-6.477 0	0.881 4
自变量	*compet*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	303 267	-0.024 3	0.025 1	-0.680 3	0.000 0
控制变量	ln*pgdp*	人均 GDP(ln)	303 267	10.602 2	0.661 3	8.310 7	12.456 5
	Finance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	303 267	2.393 2	1.182 0	0.503 7	21.296 9
	Struc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303 267	0.993 2	0.528 8	0.094 3	5.350 0
	Educ	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常住人口	303 267	0.019 3	0.024 4	0.000 2	0.146 9
	High	是否开通高铁	303 267	0.493 6	0.500 0	0.000 0	1.000 0
	Open	进出口总额/GDP	303 267	0.200 8	0.517 2	0.000 4	28.368 4
	ln*Patent*	发明专利申请数(ln)	303 267	6.223 1	1.845 9	0.000 0	12.063 0
	Size	户籍人口数(ln)	303 267	5.942 0	0.667 3	2.922 6	8.136 2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基准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2)以创新型企业进入数量的对数值为因变量,列(3)和列(4)以创新型企业进入比重为因变量,由于地方发展中同时存在创新型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因此列(5)和列(6)以创新型企业净进入比为因变量。偶数列在奇数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地方"内卷式"竞争程度越高,创新型企业进入越少;而"内卷式"竞争程度减弱则显著促进创新型企业进入,从而推动新动能的培育与发展。由此验证了命题 1:地方政府在优惠政策竞争方面投入越多,引入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Sei_number		*Sei_ratio*		*NewDynami*	
compet	-0.568 8*** (-3.216 2)	-0.523 3*** (-2.881 4)	-0.038 1** (-2.354 6)	-0.028 3* (-1.716 5)	-0.356 0*** (-5.984 9)	-0.344 2*** (-5.703 9)
常数项	1.872 8*** (415.980 8)	0.029 6 (0.119 7)	0.368 7*** (851.207 5)	0.314 8*** (11.640 1)	0.084 1*** (50.938 5)	-0.102 4 (-0.861 1)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03 267	303 267	303 267	303 267	281 019	281 019
Adj. R^2	0.859 1	0.859 3	0.938 2	0.938 2	0.301 1	0.301 4

注:表中括号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下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p<0.01$、$p<0.05$、$p<0.10$ 时有统计学意义。下同。

③ 两种处理方式在回归结果上保持一致,但加权处理考虑到了出让面积因而具有更高的合理性。

的传统型企业越多,创新型企业越少,这与 Tao 等[4]的研究结论一致。从第(6)列的经济含义来看,当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程度下降 1 个标准差时,创新型企业净进入比平均提高约 0.008 6,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9.3%。本文在后续分析中以第(6)列为基准进行回归。

(二)稳健性检验

1. 调整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29],使用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与实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之间差值占最低价标准的比重,衡量工业用地出让扭曲程度。表 3 列(1)报告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工业用地价格扭曲程度系数显著为负,且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该指标侧重刻画地方政府通过突破最低价约束开展供地竞争行为,回归结果充分表明,当地方竞争由一般性的政策竞争演变为突破规则约束、依赖过度资源投入的竞争时,对新动能培育会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从而进一步印证应当引导地方“内卷式”竞争向合理有序的良性竞争转变。

进一步地,地方政府还可能通过代建厂房、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进入和生产经营成本[9]。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容易形成“重基本建设支出、轻民生支出”的生产性支出偏向[30]。据此,本文采用一般预算内支出扣除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科学技术、卫生健康支出后的比重衡量财政支出偏向。表 3 第(2)列显示,财政支出偏向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关于“内卷式”竞争抑制新动能培育的结论并非仅由工业用地价格这一指标所驱动。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所有创新型企业加总至地级市层面,表 3 第(3)列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在 1% 显著性水平下依旧为负。此外,本文进一步用城市人工智能企业进入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见表 3 第(4)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同样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企业进入。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期初值	城市—时间趋势
compet	—	−0.029 1* (−1.885 8)	−0.204 4*** (−3.478 3)	−0.774 2** (−2.159 8)	−0.393 7*** (−6.178 0)	−0.470 9** (−2.410 6)
Distort	−0.030 5*** (−5)	—	—	—	—	—
常数项	−0.177 2 (−1.489 7)	−0.204 8* (−1.716 8)	−0.300 4*** (−2.943 1)	−2.710 5*** (−3.179 9)	−0.007 0 (−0.061 0)	20.177 3*** (56.384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81 019	281 019	4 311	4 310	264 052	281 019
Adj. R^2	0.301 3	0.301 3	0.305 8	0.972 7	0.446 6	0.312 1

3. 调整控制变量处理方式

考虑到在回归中直接使用控制变量有可能导致“坏的控制”问题,本文使用控制变量的期初值,并将其与年份固定效应相乘。表 3 第(5)列回归结果显示,原始估计结果并未受到坏控制变量问题的干扰。

4. 纳入城市—时间趋势

本文在表 3 第(6)列中纳入城市—时间趋势,即允许每个城市拥有独立的时间变化轨迹[31]。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系数仍为负,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一致,表明估计结果并非由城市特定发展节奏所驱动。

5. 剔除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市

鉴于国家对部分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再考核经济发展指标,此类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可能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为排除这一因素的干扰,本文剔除 2010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公布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录,以及 2016 年国务院批复的新增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4 第(1)列所示,本文核心结论并非由竞争激励存在特殊性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所驱动,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6. 改变标准误聚类维度与调整固定效应设定

本文分别将标准误聚类调整至城市—年份层面和城市—行业层面。由表 4 的第(2)列、第(3)列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均保持稳定。此外,本文在第(4)列将固定效应调整为年份—城市固定效应与行业—城市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核心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7. 基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平减处理

由于缺乏城市层面价格指数,本文采用省级价格指数对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进行平减处理。表 4 第(5)列显示,核心系数在统计上依然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控制价格因素后,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程度的下降仍显著促进创新型企业进入。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剔除特殊样本	改变聚类方式		增加固定效应	价格平减
compet	-0.349 5*** (-5.640 2)	-0.344 2** (-2.412 9)	-0.344 2*** (-3.751 6)	-0.301 9*** (-4.975 1)	-0.486 8*** (-6.557 4)
常数项	0.019 5 (0.135 6)	-0.102 4 (-0.387 6)	-0.102 4 (-0.651 2)	-0.131 6 (-1.237 9)	-0.117 2 (-0.979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样本量	200 120	281 019	281 019	280 079	279 387
Adj. R^2	0.306 6	0.301 4	0.301 4	0.438 4	0.302 0

(三)内生性分析

本文参考王之等[32]的做法,以 2007 年出台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作为工具变量做进一步检验。该标准的主要目的是规范工业用地出让行为,限制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低价供地开展招商引资竞争,其仅影响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即竞争程度)而与地区新动能培育无直接关系。鉴于最低价标准不随时间变化,本文利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构造 IV 的时变变量。该政策会推动工业用地价格趋于合理化,减弱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程度,因此预期一阶段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此外,该政策能够限制地方政府突破最低价约束开展低成本招商的空间,使地方竞争由依靠过度资源投入的短期“内卷式”竞争,逐步转向基于比较优势和重视发展质量的良性竞争,从而有助于城市新动能培育,预期二阶段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 5 的回归结果均符合预期,KP Wald F 统计值为 123.48,远高于常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KP rk LM 统计值为 124.65,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验证了本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表 5　内生性分析

变量	(1)	(2)	(3)
	Compet	*NewDynami*	*NewDynami*
IV	-0.000 9*** (-12.419 6)	—	—
compet	—	7.988 8** (2.241 1)	7.988 8** (2.242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03 267	281 019	281 019
KP rk LM statistic	—	124.654	124.654
KP Wald F statistic	—	123.479	123.479

注:列(2)为 2SLS 回归,列(3)为 GMM 回归。

四、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1. 优化资源配置

(1)减少传统产业用地

已有研究表明,低地价会降低传统型企业的进入门槛,扩大低效率企业及僵尸企业的生存空间。另外,低价供地强化了制造业结构的中低端锁定效应,使土地资源难以在低效率企业与高效率企业之间有效流动,不利于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4,33]。基于上述逻辑,本文依据工业用地出让行业属性构建传统产业用地比例指标。表 6 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地方“内卷式”竞争行为下降,能够显著降低传统产业用地的

表6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优化资源配置		增加创新投入		改善创新生态环境		
compet	0.319 2*** (22.222 2)	−0.463 9*** (−5.315 7)	−6.286 5*** (−31.081 5)	−1.461 2*** (−11.447 2)	−0.585 3*** (−9.995 8)	0.358 4 (1.480 1)	−1.145 7*** (−11.834 6)
常数项	1.826 9*** (39.677 7)	7.764 2*** (7.604 3)	−34.897 5*** (−75.291 8)	−13.788 1*** (−56.952 1)	−0.238 2* (−1.699 2)	0.914 8*** (4.063 5)	−1.798 1*** (−26.831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03 267	54 565	205 877	240 966	207 155	70 813	271 979
Adj. R^2	0.396 6	0.838 2	0.758 4	0.803 8	0.320 5	0.266 9	0.475 8

比重,从而优化土地要素的产业配置方向,为创新型企业发展与新动能培育释放更多空间。

(2)增加信贷支持

地方政府通过参控股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性金融机构,掌握了区域内相当部分的金融资源,并可借助行政手段干预地区信贷配置[34]。尽管地方政府开展“内卷式”竞争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吸引创新型企业进入,但在短期增长目标约束下,信贷资源仍在较大程度上会流向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的企业,从而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与新动能培育目标之间出现一定偏离,使创新型企业面临信贷支持不足的问题。由于银行贷款数据缺乏更细分的行业代码,本文选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密切的行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作为考察对象展开分析。本文在地级市层面整理并构建了商业银行投向上述行业的贷款规模数据④。回归结果见表6第(2)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下降显著提升了银行对上述行业的贷款支持力度。

2. 增加创新投入

创新性投资具有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大的特点,在地方政府领导的有限任期内以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显著提高存在一定难度,同时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35],导致创新性投资因短期效应难以显现而被忽视,以及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逻辑,本文从创新投入维度进一步检验,地方“内卷式”竞争行为下降是否改善地方在创新相关支出上的投入力度,特别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相关的技术引进及技术改造方面的经费支出。表6第(3)列、第(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关键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程度减弱显著扩大了创新投入力度。

3. 改善创新生态环境

良好的创新环境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更是创新型企业进入与成长的关键保障。地方政府是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塑造者,可以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36]。“内卷式”竞争行为下降后,地方政府更有动机将资源配置于产权保护、科研基础设施、创新服务体系等领域,从而构建更具持续性的创新生态。

基于此,本文首先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37],从行政审批效率的角度展开分析,按照地级市是否设立行政审批局将其分为两组进行分样本回归。若地级市设立行政审批局,则划分为行政审批效率较高组,见表6列(5);若未设置则归为行政审批效率较低组,见表6列(6)。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行政审批效率较高组中,地方“内卷式”竞争行为下降才对创新型企业进入具有显著促进作

④ 需要说明的是,观测值数量的减少主要受银行行业贷款数据的可得性限制。

用。此外,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传导作用,表 6 第(7)列结果表明,“内卷式”竞争下降有助于提高当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从而促进新动能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异质性分析

1. 创新禀赋

创新禀赋不仅影响地区在知识创造、技术吸收与成果转化方面的潜在能力,也会影响新兴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效率[38]。创新资源越充足、创新体系越完善的地区,越能提高技术迭代速度,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减弱对创新型企业进入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反之亦反。因此,本文依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城市创新创业指数对不同创新禀赋的城市进行中位数分组,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创新禀赋高(大于等于中位数)、创新禀赋低(小于中位数)两组。测算结果如表 7 前两列所示,在创新禀赋高的地区(列 2),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减弱对新动能培育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验证了本文命题 2 的第一点,即在城市创新禀赋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投入的收益相对越大,对优惠政策竞争的依赖越少,吸引创新型企业数量越多。

2. 财政透明度

若当地财政透明度较高,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更易受到公众与市场的监督,其对创新型企业进入的影响更容易通过正规政策工具和真实市场条件传导;反之,若财政透明度较低,地方政府更可能通过隐性手段进行资源重新分配。因此,本文用《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作为地区间财政透明度差异的分组变量,以全国地级市透明度中位数为阈值,将样本分为高透明度与低透明度两组。表 7 第(3)列、第(4)列估计结果表明,在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城市中,地方“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对创新型企业进入的促进效应更强,其系数约为财政透明度较低城市组的三倍,验证了命题 2 的第二点:地方财政透明度越高,则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的成本越大,单位投入效果越低。

表 7　异质性分析与完善绩效考核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创新禀赋		财政透明度		干部考核政策冲击	
	禀赋低	禀赋高	透明度低	透明度高		
compet	−0.387 8*** (−6.139 0)	−0.650 9*** (−3.374 0)	−0.350 9*** (−5.537 6)	−1.010 6*** (−4.750 2)	—	—
treat	—	—	—	—	0.032 5*** (11.153 5)	0.034 3*** (11.249 5)
常数项	0.630 5*** (3.678 7)	−0.870 9*** (−4.750 8)	0.920 1*** (5.384 0)	−0.858 7*** (−4.699 5)	0.072 1*** (34.166 7)	−0.169 0 (−1.420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3 973	137 046	154 706	125 146	295 487	281 019
Adj. R^2	0.334 0	0.277 0	0.317 6	0.290 4	0.299 9	0.301 6
组间差异系数检验	$P=0.000$		$P=0.000$		—	

(三)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根据命题 3,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侧重点的改变,会对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行为产生影响。中组部于 2013 年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将“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等纳入考核重点。换言之,干部考核制度改革实质上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内在激励,使地方政府由 GDP 增速式竞争向高质量与创新式竞争转型,从而为培育新动能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环境。因此本文纳入该外生政策并采用多期 DID 方法识别。根据表 7 第(5)列、第(6)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干部考核制度改革对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引入控制变量后估计结

果保持稳健。此外,平行趋势检验结果亦支持改革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在事前趋势上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五、扩展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短视激励驱动下易形成债务扩张倾向,导致债务规模偏离社会最优水平[39],并进一步影响其行政能力与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方式若逐步转向更加注重长期创新环境与资源配置效率,可能有助于缓解债务扩张,推动地方债务规模回归更加合理和可持续的区间。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讨城市“内卷式”竞争下降是否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地方债务变化对城市新动能培育的影响。表 8 首先分析了地方“内卷式”竞争对债务规模的影响。第(1)列 ~ 第(4)列分别以城投债余额、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专项债余额和一般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能够显著降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

表 8　缩小地方债务规模

变量	(1)	(2)	(3)	(4)
	城投平台有息债务/GDP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GDP	专项债余额/GDP	一般债余额/GDP
compet	1.067 2 ***	2.285 0 ***	3.977 9 ***	0.611 6 ***
	(19.317 3)	(21.428 6)	(20.863 3)	(17.239 8)
常数项	-4.341 6 ***	7.623 9 ***	1.339 9 ***	9.398 5 ***
	(-22.735 6)	(42.235 2)	(4.235 9)	(28.381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8 532	128 752	128 752	128 752
Adj. R^2	0.808 7	0.893 0	0.822 4	0.942 1

既有研究在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风险时,一般将波动性而非规模变化作为刻画不稳定性和风险累积的重要视角[40]。借鉴上述文献的处理思路,本文采用地方政府债务波动性[2]来进一步检验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及其在新动能培育中的作用。表 9 中 Panel A 的前四列分别以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专项债余额、一般债余额以及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占 GDP 比重的三年标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41]。其回归结果均显示,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下降显著降低了各项债务指标的波动幅度,而 Panel B 的结果又进一步表明,地方债务风险降低会显著促进创新型企业进入。因此降低地方政府的“内卷式”竞争有助于缩小地方债务规模、降低地方债务风险,从而为新动能培育创造良好的长期基础。

表 9　降低地方债务风险

Panel A:“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风险				
变量	(1)	(2)	(3)	(4)
	地方政府债_sd	专项债_sd	一般债_sd	城投债_sd
compet	0.520 5 ***	0.527 5 ***	0.331 6 ***	0.104 7 ***
	(20.340 7)	(12.157 0)	(27.219 3)	(6.480 1)
常数项	0.422 0 ***	1.044 5 ***	0.894 9 ***	0.242 9 ***
	(10.206 0)	(13.869 1)	(24.626 4)	(3.347 6)
样本量	128 752	128 752	128 752	126 727
Adj. R^2	0.532 7	0.590 2	0.412 0	0.415 0
Panel B: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有助于吸引创新型企业进入				
变量	(1)	(2)	(3)	(4)
地方债务风险	-0.093 5 ***	-0.044 6 ***	-0.099 2 ***	-0.021 7 **
	(-4.291 3)	(-4.024 5)	(-5.404 1)	(-2.061 6)
常数项	0.753 3 ***	0.767 9 ***	0.808 1 ***	0.882 4 ***
	(2.600 6)	(2.649 5)	(2.784 2)	(3.020 9)
样本量	122 713	122 713	122 713	120 826
Adj. R^2	0.347 8	0.347 8	0.347 9	0.348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首先,地方“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创新投入和改善创新生态,进而促进新动能培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地方政府在优惠政策竞争与营商环境优化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地方政府的“有所为”应侧重于优化创新环境、增加创新投入,以有为政府推进有效市场建设吸引创新型企业进入。再次,城市“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对新动能培育的促进作用在创新禀赋较好、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干部考核制度改革有助于改变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制度环境。最后,“内卷式”竞争程度下降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扩张的规模,为新动能培育创造良好的长期基础。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正确政绩观,引导地方政府从短期“内卷式”竞争向长期良性竞争生态转变。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和 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规范地方政

府在招商引资中违规提供税费、土地、电价等优惠甚至举债搞补贴,加快出台地方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坚决整治通过“抽屉协议”等方式变相违规招商。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绩评价体系。

第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新动能培育的要素流动渠道。继续推动工业用地供给方式改革,完善长期租赁、弹性年期、先租后让等制度,扩大标准地出让范围,引导土地资源向创新型、技术型企业配置和倾斜。在资金要素配置方面,大力推动金融机构完善科技金融产品体系,强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企业、初创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及融资效率。

第三,加强地方政府财政与债务治理,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财政制度。一方面,应严格落实预算约束和债务限额管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预算、决算的监督作用,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强化隐性债务治理,防止财政压力通过行政式干预传导到企业或金融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科技研发、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与营商环境建设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减少对短平快投资及招商项目的依赖。

第四,增强城市创新禀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提高产业发展内源动力。一要加强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的协同布局,提升城市承载重大研发任务的能力;二要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动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创新提供高效资源供给;三要建设开放、透明、稳定的制度环境,扩大包容审慎监管试点,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和数字政务,降低创新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五,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当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吸引力。一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体系,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及对创新企业的吸引力;二是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保障,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三是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逐步实现从土地竞争引企向营商环境引企的本质转变。

参考文献:

[1]戴宏伟,郑立晨,王佳宁. 淡化 GDP 考核促进地方产业政策绩效: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季刊),2026,26(5):1630-1648.

[2]杨海生,陈少凌,罗党论,等.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4(9):13-28,187-188.

[3]余东华,吕逸楠. 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2015(10):53-68.

[4]TAO R, YU J, ZHAO Z. Race-to-the-bottom dynamics in industrial land pricing: asymmetric effects of China's 2009 price floor adjustment polic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7, 184: 103910.

[5]方红生,张军.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预算软约束与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J]. 经济研究,2009,44(12):4-16.

[6]陈钊,初运运. 新兴企业进入与产业链升级:来自中国无人机行业的证据[J]. 世界经济,2023,46(2):85-107.

[7]HAN Y, WU M. Inter-regional barri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4, 167: 103197.

[8]刘志彪,王兵. 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与破解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2024(12):3-15.

[9]王海燕,张占斌. “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及治理[J]. 改革,2025(3):11-21.

[10]黄群慧,叶其楚. 中国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 改革,2025(6):13-27.

[11]王垒,李金泽,丁黎黎. “链长制”产业链政策与制造业“内卷式”竞争治理[J]. 改革,2026(6):100-113.

[12]蔡伟毅,秦思佳,孟小淇. 战略联盟如何推动“内卷式”竞争向良性竞合转变[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6,43(8):235-260.
[13]徐翔,李帅臻,李涛.“内卷式”竞争与高质量创新:基于熊彼特增长模型的分析[J]. 世界经济,2026,49(7):66-101.
[14]张昊,严玉珊,王心怡,等. 线上商家“标题党”行为与内卷式竞争[J]. 世界经济,2026,49(5):108-138.
[15]李雪松,高辛睿. 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基于239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5(4):183-195.
[16]郭剑鸣,吴亚亚.“内卷式”竞争与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的内在逻辑及其风险:一个财政政治学的分析框架[J]. 政治学研究,2026(3):181-199,212.
[17]李长英,周荣云,余淼杰. 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演进及区域特征[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2):3-23.
[18]王铭槿,李永友. 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旧动能转换进程:趋势特征与省际差异[J]. 经济学家,2022(9):28-38.
[19]李晓华. 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 改革,2019(11):40-51.
[20]董明放,韩先锋.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J]. 统计研究,2016,33(1):45-53.
[21]陆国庆,王舟,张春宇.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补贴的绩效研究[J]. 经济研究,2014,49(7):44-55.
[22]唐为,邱旋,陈子曦. 政府引导基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协同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42(9):52-71.
[23]PRUD'HOMME D. Dynamics of China's provincial-level specialization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8): 1586-1603.
[24]吴敏,周黎安. 晋升激励与城市建设:公共品可视性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8,53(12):97-111.
[25]周慧珺,傅春杨,王忏.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J]. 经济研究,2024,59(1):93-110.
[26]马越越,王维国.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J]. 中国管理科学,2021,29(12):68-80.
[27]黎斌,贺灿飞,周沂. 相关多样化、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重化工业企业动态[J]. 经济地理,2016,36(6):91-99.
[28]CHEN S, MAO H, FENG Z.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firm entry: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20: 16-30.
[29]黄健柏,徐震,徐珊. 土地价格扭曲、企业属性与过度投资: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价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5(3):57-69.
[30]TSUI K, WANG Y. Between separate stoves and a single men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77: 71-90.
[31]KONG D, LIU C. Centr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personnel authority reform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4, 229: 105030.
[32]王之,田文佳,张庆华. 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2024,24(1):271-285.
[33]阳立高,韩峰,曾艺. 土地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基于土地市场交易价格和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 管理科学学报,2022,25(7):106-126.
[34]刘潘,张子尧. 地方公共债务与资源配置效率: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分布差异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23,58(10):114-133.
[35]吴延兵. 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J]. 经济研究,2017,52(6):137-152.
[36]ACEMOGLU D, MOSCONA J, ROBINSON J A. State capacity and American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5): 61-67.
[37]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等.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J]. 经济研究,2018,53(2):140-155.
[38]戴宏伟,郑立晨,王佳宁. 喜新厌旧? 高科技产业政策有效的边界条件与跟风行为:基于20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3(7):35-43.
[39]石光,岳阳,张过. 政府换届周期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J]. 世界经济,2021,44(4):178-200.
[40]高然,祝梓翔,陈忱. 地方债与中国经济波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22,57(6):83-100.
[41]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